

【译 文】

西方对他者的殖民表征：以异域西藏为案例¹

Dibyesh Anand 著，励轩译

摘要：非西方他者的文化表征是西方殖民和新殖民话语的核心。对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的批判性政治分析，涉及到两个层次的认识——在以精炼化和成见化的方法提供骨架的同时，各种策略（诸如婴孩化、色情化、贬抑化、理想化和自我肯定）也为想象的他者增添了血肉。虽然这些策略并不是非历史地一成不变，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策略保持稳定。在本文中，笔者将识别重要的修辞策略。这些策略塑造西方对**非西方他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西方的殖民表征——的特征，同时通过对**异域西藏**（对西藏异域化的西方式表征的简称）的实证研究予以证实。

非西方他者的文化表征是西方殖民和新殖民话语的核心。对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形象的批判性政治分析，涉及到两个层次的认识——在以精炼化和成见化的方法提供骨架的同时，各种策略也为想象的他者增添了血肉，诸如婴孩化、色情化、贬抑化、理想化和自我肯定。虽然这些策略并不是非历史地一成不变，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策略保持着稳定，类似于萨义德所说的，“表征的手段制造了一个可见、清晰的东方，在话语中关于理解东方的‘那儿’所依赖的“制度、传统、习俗的准则，而不是一个遥远和模糊的东方。”² 在本文中，笔者将识别重要的修辞策略。这些策略塑造西方对**非西方他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西方的殖民表征——的特征，同时通过对**异域西藏**（对异域化西藏西方式表征的一个简称）的实证研究来予以证实。

表征原住民

在欧洲帝国主义背景中，原住民的表征问题常常被认为属于科学客观的民族志学、新闻评论或者虚构小说的领域。³ 据说在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之间，存在着一条清晰的边界。人们假设，与小说不同，非小说类作品诸如文学和大众化新闻报道、探险和旅行游记、殖民官员的回忆录等等，不必理会虚构文学作品的有意识的美学要求。⁴ 非小说类作品的重点在于对所观察到事实的记录。然而，由于来自后殖民研究⁵、人类学⁶和国际关系学⁷各领域学者们的反对，这种观点不再

¹ 英文原文题目为“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e case of Exotica Tibet”，刊载于*New Political Science*, 29 (1): 23-42, ISSN 0739-3148.

²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New York: Penguin, 1978), p.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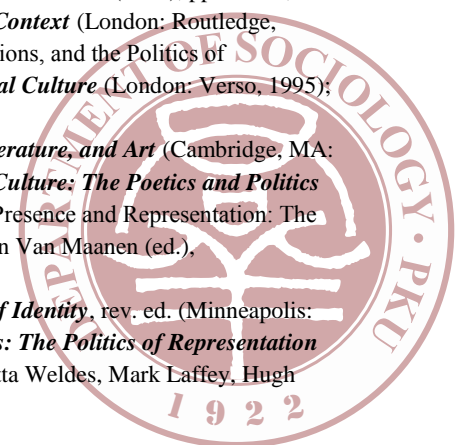
³ David Spurr,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⁴ Ibid.

⁵ Homi K. Bhabha, “The Other Question—The Stereotype and Colonial Discourse,” *Screen* 24:6 (1983), pp. 18–36; Anne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1995); Said, op. cit.; Ella Shohat, “The Struggle over Representation: Casting, Coali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 in R. de la Campa, E. A. Kaplan, and M. Sprinker (eds), *Late Imperial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5); Spurr, op. cit.

⁶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Johannes Fabian, “Pre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The Other and Anthropological Writing,” *Critical Inquiry* 16:4 (1990), pp. 753–772; John Van Maanen (ed.), *Representation in Ethnography* (London: Sage, 1995).

⁷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rev.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1992); Roxanne L.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Jutta Weldes, Mark Laffey, Hugh



站得住脚。从萨义德开始¹，后殖民理论的发展已经揭开了所谓学者中立的粉饰，强调指出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和表征，既不是单纯的也并非基于某些业已存在的“现实”，而是暗示着西方对权力和帝国冒险的欲望。一个科学的、非政治的、无私的、追求知识的“绅士”不顾一切去客观地研究非西方文化的虚伪形象，已经被揭露。例如，印度马德拉斯第一任测量总监 Colin Mackenzie，就很清楚在殖民列强的残酷现实中他将需要什么样的共谋者。他把军人和科学家的角色合二为一，写道：

在军营和军事航海的空闲时光，科学可以提供帮助，知识能被传播，这一点都不新奇；但……我也想证明，特别是在印度的逗留和战役的空闲时光，这些搜集来的观察资料也被发现很有用。如果不去记录它们对哲学和科学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些事实，至少这些观察资料非常有助于引导那些更加有天赋的观察者转向实用的方向。²

在殖民话语中，客观性的面具掩盖了不平等和支配关系。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都渗透着带有各种表征的策略。对于寻找东方以求认识东方的具体方式而言，这些并不是附带的，而恰是核心的内容。Rana Kabbani 针对游记提出的如下观点，同样广泛适用于非小说类作品，他指出：在帝国主义时期，它最终产生了“一种共同的东方形象”，“这种东方形象使一种政治结构得以维持，同时它也凭靠这种政治结构得以延续。”³

各种再现非西方世界的方式——可视的（电影、电视、照片、绘画、广告等等）和文字的（诸如小说、游记、新闻、人种志学和人类学）——都和帝国面对的结果紧密相关。生产力水平的不对称，是这些相遇场景的一个共同特点。当代新殖民世界也“证明了文化表征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力量，这种文化表征涉及到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和社会竞争。”⁴ 表征方法不仅建构了作为主体和服从于这一过程的**被表征者**（这里指被殖民者、第三世界和南方），甚至还建构了**表征者**（殖民者、第一世界和西方）。这决不意味着对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表征者和被表征者）而言，他们会有相同的经历，它只是暗示了虽然每个人都受表征方法支配，但是根据存在的权力关系不同，各自所受的影响也不同。为了阐明这点，当西方人和藏人都是异域西藏的主体时，后者不只是受害者，而且还通过创造性谈判训练了他们的代理人，而西方则不必根据藏人的观点去建构它的身份。西方人异域化西藏，反过来，藏人异域化西方。但当西方人的异域化对藏人的认同话语带来明确和富有成效的影响的同时⁵，我们却不能说藏人对于西方的异域化也有同样的效果。而这恰恰反映出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对称。

对西方人表征的关注并不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表征方法在非西方社会也很流行。事实上，历史上所有文化和文明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表征方法来观察他们所认为的**他者**。但是——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只是伴随着现代欧洲帝国主义的出现，这种把这些表征系统的、大规模的转化为真理的能力才出现。他们的生产力使得这种表征方法具有了显著的现代特征，通过表征来制造关于**他者**的知识与建构、表达、肯定，这对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差异有密切关系，而它反过来又不断进入表征者与被表征者之间的身份政治。

Gusterson, and Raymond Duvall (eds), *Cultures of Insecurity: States, Communiti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Dang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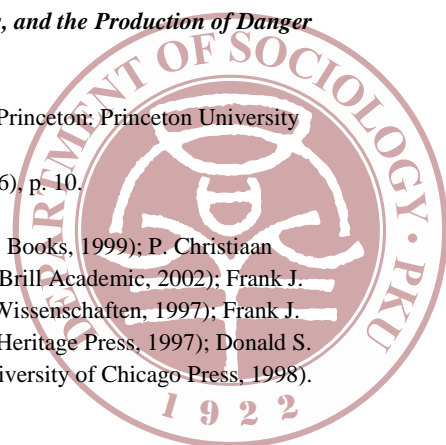
¹ Said, op. cit.

² Nicholas B. Dirks, *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84.

³ Rana Kabbani, *Imperial Fictions: Europe's Myths of Orient* (London: Pandora, 1986), p. 10.

⁴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71.

⁵ Clare Harris, *In the Image of Tibet: Tibetan Painting after 1959*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9); P. Christiaan Klieger (ed.),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Voices of Difference* (Leiden: Brill Academic, 2002); Frank J. Korom (ed.), *Tibetan Culture in Diaspora* (Wien: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7); Frank J. Korom (ed.), *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Quebec: Heritage Press, 1997); 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精炼化和成见化他者

精炼化和成见化他者的方法，构成了西方式各种表征策略的基础。精炼主义是这样一种概念，这些概念的核心意思或认同是明确的，不需要加以解释。Ronald Inden 写道，精炼法倾向于忽略“代理人的复杂性”（intricacies of agency），而“代理人的复杂性”和任一社会体系的演变与发展有关联。¹ 在殖民语境中，在把原住民简化为“本土”的“本质”概念后，我们得到了精炼主义：比方说，非洲人是唱歌、跳舞和好斗的，中国人是爱搞两面派的，阿拉伯人是残忍的同时是女性的压迫者，藏人是宗教性的，等等。帝国主义从对原住民的诸多表征中抽掉了它的长处部分，因此原住民被描述为极其懒惰、愚昧、不诚实、冷漠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土著统治者则被确认为腐败和专横的。因此，那些参加 1903-1904 年入侵西藏的英国军官们竟然认为，寻求摆脱中国和寺院领主的“普通”藏人将会欢迎英军的入侵。我们对这一点不必惊奇。Cecil Rawling 上尉在 1905 年的一份军事报告中写道：“看起来这个国家（西藏）的居民普遍认为他们应该处于英国统治之下”²。说来也怪，Alistair Lamb 自己的看法，也把负责帝国扩张的义务施加到了受害者自己头上，他觉得“当我们与中亚的原住民打交道时，问题往往不在于如何去扩张（英）帝国的力量，而是如何去防止它的无限扩张”。³ 他们的精炼主义表征使得对家长式帝国主义的需求——一种铁拳和天鹅绒手套的混合成为可能。

成见是对一个团体/文化的片面描述，它把复杂的差异消解成简单的“硬纸剪画”，把人们看作是预设的形象，并且“更多地是把人看作是一种公式，而不是把人看作人”。⁴ 成见把人简化为一些简单的特点，然后表征为本质上一成不变的。“成见式简化、精炼化、自然化和固化‘差异’。”⁵ 成见是作为正常和异常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标记。正如萨义德所认为的，很长时间来，东方的刻板形象——“它的古怪、它的落后、它寂静的冷漠、它女性化的可渗透性，它消极的柔韧性”——一直是西方话语实践的一部分。⁶ 成见化有助于把帝国主义解释为文明的任务——“白人”以活跃、诚实、积极、探险、男子气、开明、现代的精神挺立着，与原住民懒散、不诚实、消极、宿命论、女子气、落后和传统的无精神性形成鲜明对比。例如，John Noel 上尉的电影《珠峰探险》（1922）和《珠穆朗玛史诗》（1924）都形成了“外向的、有进取心的和男子气的英国登山者和内向的、消极和邈远但神秘的藏人之间的对比。”⁷

成见化是一种简单化，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对一种给定的真实事物的虚假表征，而是因为它是一种停滞的、固定的表征方式，否认与这种表征不一致的事实。让我用最早攀上喜马拉雅山的两个人——丹增诺杰（Tenzing Norgay）和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的故事作为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到了山顶，丹增说他感到高山温暖的存在，埋了祭品给诸神，并祈祷道：“我很感激，珠穆朗玛”；希拉里则进行拍照来测量地形，在山顶上撒尿，后来还告诉其他一位登山者 George Lowe：“George，我们征服了这狗杂种”⁸。这种态度上的不同，有可能是源自文化因素。但是

¹ Ronald Inden, *Imagining India* (Oxford: Blackwell, 1990), p. 20.

² Quoted in Alastair Lamb,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 The Road to Lhasa 1767 to 1905*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0), p. 296.

³ *Ibid.*, p. 101, emphasis add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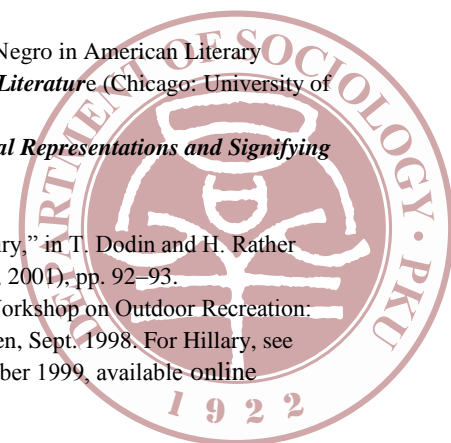
⁴ Seymour L. Gross and John E. Hardy, “Introduction: Stereotype to Archetype: The Negro in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in S. L. Gross and J. E. Hardy (eds), *Images of the Negro in American Litera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p. 2.

⁵ Stuart Hall,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pp. 257–258.

⁶ Said, *op. cit.*, p. 4.

⁷ Peter Hansen, “Tibetan Horizon: Tibet and the Cinem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T. Dodin and H.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2001), pp. 92–93.

⁸ For Norgay see Peter Hansen, “Inventing Virtual Sherp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Outdoor Recreation: Practice and Ideology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Umea, Sweden, Sept. 1998. For Hillary, see Outside Online, “The Man who Knocked the Bastard Off,” *Outside Magazine*, October 1999, available online



把谦逊解读成顺从，把丹增（标示为夏尔巴人和其他原住民的代表）的个性固化为极其被动，与爱冒险的、科学的希拉里（标示为白人）做对比，造成了一种具体化和固定化的表征方式（排除那些不“适合”这种形象的人）。成见化并不关乎表达文化差异，而是用极端的权力差异性把文化差异置于一个预设的社会文化背景中。

成见在表征和心灵两个层面为帝国主义服务——支撑家长式统治的理念，并且充当一种有知觉的障碍物以保护殖民者，使其远离令人不安的贫乏感或罪恶感。¹它允许英国侵略西藏期间在Guru发生的对藏人大屠杀的参与者，去把责任归咎于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包括“藏人将军”、恶毒的僧侣、迷信的藏族士兵“不顾他人的愚蠢和孩子气”²。我们必须把普通的原住民从他们野蛮的领导人那里解救出来——这一观点在弗朗西斯·荣赫鹏上校1903-1904远征西藏纪实中可以看到，在批评了藏人的奸诈、不道德、过度宗教化、肮脏和懒惰后，他说道：“他们身上也有潜在的优秀品质，只是等待正确的碰触以激发出来”³。我们也许会想起1798年拿破仑进入埃及时的声明：“埃及的人民，有人告诉你们，我来是为了摧毁你们的宗教；别相信这个！我来是为了恢复你们的权利，惩罚篡位者，而且我比马木鲁克神更尊重先知和《古兰经》”⁴。

虽然在日常交谈中我们倾向于把成见只用于负面形象，但是成见也有双重性和矛盾性。⁵正如Michael Hunt在他的种族等级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中所指出的，美国人为“东方人”创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适用于家长制和慈悲时代的正面形象和一个适用于滥用权力和权力扩张为主导时代的负面形象。”⁶虽然有时正面的成见也许在政治和社会上有助于一个团体，但终究它会使被表征对象具体化地陷入他们自己停滞的形象。在藏人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极清楚地看到这个问题。藏人看起来成为了他们成见化形象的囚徒。提及针对西藏的刻板话语的真正效果，Donald Lopez指出它“不仅创造了关于西藏的知识，在很多方面，它创造了**西藏**，流亡藏人努力运用这个**西藏**在流亡中赢得一席之地以及他们国家的独立。”⁷然而，这些成见只合法化特定目标和行动以适合实现它们——流行的成见主要把藏人刻画成要求外部援助的被动受害者。而且这个外部援助是以很高的代价换取的。正如降央诺布（Jamyang Norbu）所说：“比起在**西藏幻想**中被模式化为超凡角色，藏人在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过得很好，但是他们的事业是无望的，他们的存在是被边缘化的。”⁸

表征的策略

尽管有共同性和连贯性，它的复杂性、抵抗性和矛盾性构成了西方殖民表征的核心。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所涉及到的表征，来质问帝国主义西方用来表征**他者**的富有想象力的实践策略。虽然往往有意去具体化被表征者，但是这却被表征的本质所削弱——它不是单独的行为，而是一个必要的复制品。在西方对**他者**文化的表征中往往存在一个悖论——显而易见和不可思议之间、

at: <http://outside.away.com/outside/magazine/1099/199910hillary1.html>. (accessed July 28, 2006).

¹ Richard Ned Lebow, *White Britain and Black Ireland: The Influence of Stereotypes on Colonial Policy* (Philadelphia: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 1976), p. 22.

² Parshotam Mehra,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23.

³ Francis Younghusband, *India and Tibet: 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which hav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the Time of Warren Hastings to 1910*; with 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Mission to Lhasa of 1904 (London: John Murray, 1910), p.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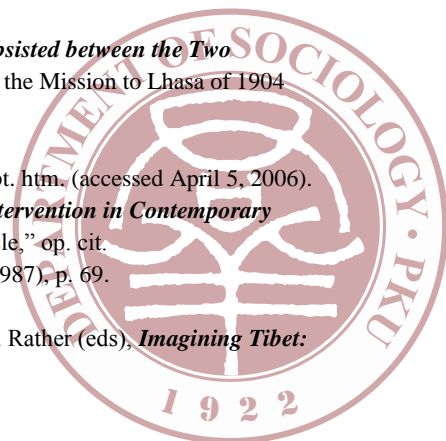
⁴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Napoleon Invades Egypt,” undated,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usna.edu/Users/history/tucker/hh362/Napoleon%20invades%20Egypt.htm>. (accessed April 5, 2006).

⁵ Bhabha, “The Other Question,” op. cit.;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Hall, “The Spectacle,” op. cit.

⁶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69.

⁷ Lopez, op. cit., p. 10.

⁸ Jamyang Norbu, “Behind the Lost Horizon: Demystifying Tibet,” in T. Dodin and H.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2001), p. 378.



渴望和否定之间、差异和熟悉之间无法解决的对立关系。因此，**异域西藏**不是一个缺乏对立的独特现象；相反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真正复杂的对立，一个充满矛盾和对立的复杂体。”¹ 如此之近，却又遥不可及！正如 Slavoj Žižek 所提到的：

伴随着与其对立面的完全一致，西藏形象的非连续性看起来证明了它的**幻想性**地位。藏人被描绘成这样一群人，他们过着简单的精神上满足的生活，他们完全接受他们的命运，他们从西方人的过度物质渴求中被解放出来，同时又是满身污秽、欺骗、残忍、性乱交的原住民……社会秩序则被表征成一种有机和谐的模式，残忍腐败神权暴政保证了普通人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²

这篇文章接下来的部分，显示出在西方帝国主义背景下针对非西方他者表征中最普遍的话语策略，并把异域西藏作为主要的实证性调查点。

档案馆

档案馆一般被理解为一个包含记录、文献、照片、电影或其它有关历史遗迹材料的场所或收藏。档案馆也能被指涉已存记忆、信息、神话、传说、传奇的存放处。³跟他者的相遇不会在真空下发生——人们在预设的形象中理解它。帝国特权和先在“知识”塑造了当时可知的东西。这包括那些被发现的古典作品、宗教的和圣经的资料来源、神话、旅行家的记述（尽管很难把描述和传奇区分开来）和小说作品。这些提供了一个文化框架，通过它我们可以观察、描写、表征他者。东方主义本身起到档案馆的作用——充满着归纳化，因为态度就是“随便挑一个东方，无论哪个东方”⁴，而故事将会是一样。正如萨义德所说：某种程度上东方主义是一座图书馆或档案馆，保存着普遍的，在某些方面毫无异议的信息。⁵ 在文化相对来说未知的环境中——比如西藏——道听途说、传奇和幻想起到了一种更为重要的档案功能。⁶尤其是 19 世纪以前的对西藏的表征者常常利用这些档案，用于补充稀少的传教士和旅行家的纪实。Hugh Richardson 的观点，即早期西方人的暗指仅仅揭示了藏人在邻国被誉为“行事古怪并具有少见的神奇力量”⁷，这一观点在 20 世纪还被认为是正确的。对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评价基于一个神话、传奇、道听途说与事实之间鲜有区别的档案馆。西方作者建构“事实”不是通过参考西藏这个地方，而是通过复制和互相参照。

注视

监视是一种手段，通过它在不可抗拒的注视之下，非西方主体被表达成“一种可知的、可视的有惩戒性权力的客体。”⁸ 注视不仅仅是单纯的好奇：“注视包含着比看更多的含义——它意味着一种心理上的权力关系，即注视者比被注视对象要高级。”⁹ 通过观察、检验和解释，被注视对象被区别、归类和鉴定，同时准备依遵照行事。被注视者的客体化（固定了它的本质）与主体化紧密相关——针对被注视者的身份认同，注视和监视是富有成效的。

全知的白“人”、殖民导师、西方的注视把监视塑造成一种用于表征他者并使之有惩戒性的

¹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a Sacred Landsca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63.

² Slavoj Žižek, *On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64–66, capitalization in original.

³ For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archive, see 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Trans. E. Penowit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Dirks, op. cit.;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avistock: London, 1972); Thomas Richards, “Archive and Utopia,” *Representations* 37 (1999), pp. 104–135; Carolyn Steedman, “The Space of Memory: In an Archiv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1:4 (1998), pp. 65–83.

⁴ Ziauddin Sardar, *Orient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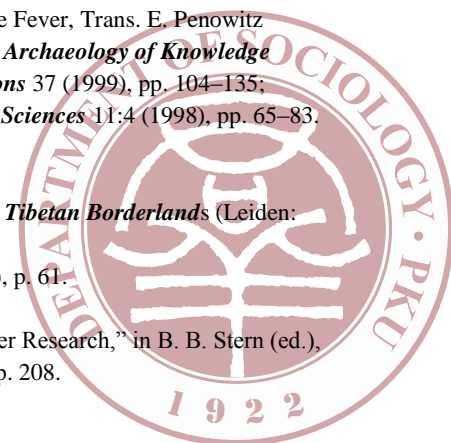
⁵ Said, op. cit., pp. 41–42.

⁶ Dibyesh Anand, “Archive and the Poetics of ‘Exotica Tibet,’” in P. C. Klieger (ed.), *Tibetan Borderlands* (Leiden: Brill Academic, 2006).

⁷ Hug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1.

⁸ Doty, op. cit., p. 11.

⁹ Jonathan E. Schroeder, “Consuming Representation: A Visual Approach to Consumer Research,” in B. B. Stern (ed.), *Representing Consumers: Voices, Views and Vis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08.



策略。监视使得对被注视者身体可视的占有成为可能，也使对安全荫蔽了注视者身体的手段的干预成为可能。¹接着，观察被表征为冷静、客观的事实。注视是无形的——人们作出陈述，仿佛在观察背后并没有观看者。

这并不是说非西方人视觉受损，无力注视西方。但是在大部分现代时期，帝国主义权威确保了支配权和控制权维持在西方“人”手里。“放眼皆吾土”式的辞令态度一直是西方特有的。²通过监视、注视和观察而建立的支配伴随着各种对被注视对象统治的巩固。他们以科学好奇、人种志材料搜集、保护单纯的大众免受他们残暴的统治者、或者传播进步的名义进行占用。

进入西藏的英国殖民官员和军官往往把他们的纪实当作是科学探险，或者是激动人心的冒险，³或仅仅是“日常的”观察。⁴在单纯夸大其词的旅行描述诸如“食草猎人冒险和探索的故事”⁵背后是帝国主义的暴力。虽然在欧洲他们的注视也许被当作冒险家和浪漫主义者的行为，但是他们对于原住民的影响跟一些坚毅的军人一样——通过政治规则和知识构成实现了控制的建立和制度化。求知是拥有的前奏，特别是如果存在一个巨大的权力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导致那里的环境对1903—1904年西藏任务的一个参与者去说这样的话显得完全可以接受：“事实上，拉萨显而易见的财富确实使我们留口水。但是，老实说，藏人不会卖这些东西；虽然拉萨是不错的抢劫对象并且还在我们掌握之中，但用**武力**（作者在打印的文本上用钢笔添加了这个字）来抢夺不大值得。”⁶通过强迫来获得无价的艺术品并将它们纳入西方的私人 and 公共收藏中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矛盾的是，使他者可行的工程和使他者成为原始简单形象，与存在不可思议和神秘元素的认识密切相关，这一认识使得对**他者**的彻底理解成为不可能。当谈到他自己未能弄清平措（Phuntsog，一个藏人，因为他学会帝国主义者的语言，他不再被认为是“真正”的原住民）的不安时，Edmund Candler，一个早期记者的例子（他是一位伴随英国人在1903-1904年入侵西藏的《每日邮报》记者），把他称为“好动的西方活力与激动人心但肮脏肤浅的东方头脑奇怪的混合体。他们深刻吗？谁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人不可理解，人们不可能看到他们的心里。”⁷

受困于“东方人”的不可接触性、不可见性以及不可理解性，西方人渴望把他们纳入持续的调查。面纱成为所有引诱、挑逗以及阻止西方人求知的隐喻。它是“一种修辞，借助这种修辞，西方人渗透进神秘东方以及进入他者内部的幻想，得到了梦幻般的实现”⁸。监视和注视有助于固化东方、他者的其他表征策略，尤其是那些寻求分类、区别并为他者（反过来是为自己）提供身份认同的表征策略。

区别—分类

¹ Spurr, op. cit., p. 22.

² Mary Louis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201.

³ See, for instance, Frederick Markham Bailey, *No Passport to Tibet* (London: Travel Book Club, 1957); Harrison Forman, *Through Forbidden Tibet: An Adventure into the Unknown* (London: Jarrolds,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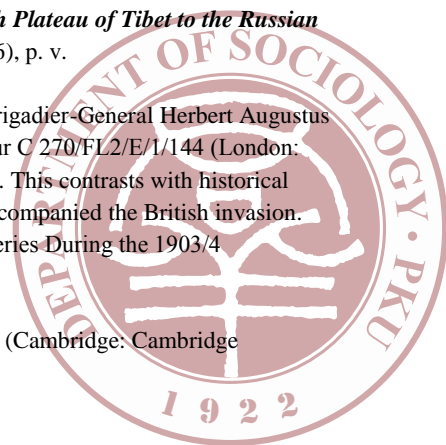
⁴ Thomas Gordon, *Roof of the World: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ver the High Plateau of Tibet to the Russian Frontier and the Oxus Sources on Pamir* (Edinburgh: Edmonston and Douglas, 1876), p. v.

⁵ Frank Kingdom Ward, *A Plant Hunter in Tibet* (London: Jonathan Cape, 1934).

⁶ Herbert Augustus Iggulden, “An Undated Account of Lhasa and its Inhabitants by Brigadier-General Herbert Augustus Iggulden (1861–1937), Chief Staff Officer Tibet Mission Escort, 1903–04,” MSS Eur C 270/FL2/E/1/144 (London: Oriental and India Office Collection, British Library, undated), p. 6, emphasis added. This contrasts with historical works that have shown widespread looting and forcible “securing” of objects that accompanied the British invasion. See Michael Carrington, “Officers, Gentlemen and Thieves: The Looting of Monasteries During the 1903/4 Younghusband Mission to Tibet,” *Modern Asian Studies* 37:1 (2003), pp. 81–109.

⁷ Edmund Candler, *Unveiling of Lhasa*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5), p. 206.

⁸ Maya Yegenoglu, *Colonial Fantasies: Towards a Feminist Reading of Orien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9.



区别和分类，两个在现代主体¹的形成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在西方对他者的表征中也非常明显。西方和他者之间构想出来的区别加强了这些表征。根据认同表达个人和集体自我的需要来自于区别原则的内在化。分类在所有对非西方人的纪实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它监管话语、安排角色、管理团体、巩固边界。² Lobsang Rampa³谈到的他自己在西方的待遇，反映了占统治地位的西方人对东方奇物展览的好奇：“不幸的是，西方人把我看成是一件奇物，看成是一个应该被装入笼子并作为来自未知世界的怪物来进行炫耀的物种。这使我很好奇，正如他们正努力在做的，如果西方人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们——雪人，将会对他们做什么。”⁴ 考虑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分类偏好和高傲自大，我们很难不同意Rampa关于雪人命运的猜测：“如果西方人如意了，我们可怜的雪人将被抓住、解剖并在精神上得以保存。”⁵

某些分类法也许对理解很重要，对非西方人的分类往往跟文化的层级化和种族化有密切关系。把他者分类为野蛮人使得它的非人性化得到认可，同时也被当作采用暴力手段实施欧洲标准的正当理由。⁶在顶端的是欧洲白人，在低端的是“土著”非洲人和在“新世界”的原住民。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在层级表上占据了不同的位置。19世纪和20世纪对种族化文化的迷恋也能在藏人的案例中看到，在这一案例中，不同的评论者都在努力定义藏人“种族”的特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Graham Sandberg，在评论中，他很直白的把“西藏种族‘当作一群软弱怯懦的人，他们的虚弱导致他们很容易屈服。’”⁷种族主义与肤色关系不大，而更多与权力相关，在19世纪英国人把爱尔兰人看作是“有色人”、“白色黑人”⁸使得这一事实变得很明显。William Frederick O'Connor上尉在20世纪初对西藏的观察是很好的证明：“普通人是无忧无虑的生物，荒谬的是他们的行为像爱尔兰人，有时甚至他们的性格也像。”⁹另一方面，法国旅行家Alexandra David-Neel发现拉萨的浪荡僧看起来像一个“真正的黑人。”¹⁰当糅合了种族化、进化论和层级化，区别化、分类化和识别导致了绝大多数非西方原住民被矮化和否定以及部分被理想化。

矮化-理想化

貌似对立的矮化（由之引申的否定）和理想化（由之引申的肯定）手段有相似的辞令结构；这些涉及到脱境（decontextualization）和他者化的程序。在西方对非西方的表征方面，高贵者和卑贱者的二元一直是这种话语实践的产品。作家和观察家轻而易举实现了对西藏文化的极力否定和高度赞扬之间的转换可以证明这一点。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藏人不是被看作“落后和野蛮的”

¹ 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P. Rabinow (ed.) (London: Penguin, 1984), pp. 7–11.

² Spurr, op. cit., p. 63.

³ Author of several popular books on the theme of Tibet such as *The Third Eye*, Rampa claimed to be a Tibetan monk in an Englishman's body. Tibetan specialists considered him a fraud (see Lopez, op. cit.) and revealed that he had never been to Tibet or even outside England when he wrote his first book in 1956 opening with: "I am a Tibetan. One of the few who have reached this strange Western world" (p. 9). This revelation did not prevent his works from becoming best sellers and from reputable newspapers hailing his accounts as authentic. T. Lobsang Rampa, *The Third Eye: The Autobiography of a Tibetan Lama*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1956).

⁴ T. Lobsang Rampa, *Doctor from Lhasa* (London: Souvenir Press, 1959), p. 9.

⁵ Rampa, *The Third Eye*, op. cit., p.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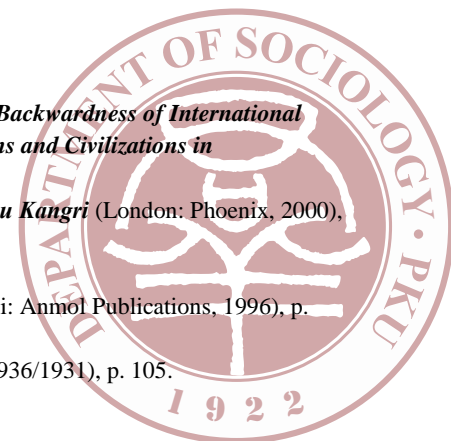
⁶ Paul Keal, *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rk B. Salter, *Barbarians and Civil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Pluto, 2002).

⁷ Chris Bonnington and Charles Clarke, *Tibet's Secret Mountain: The Triumph of Sepu Kangri* (London: Phoenix, 2000), p. 209.

⁸ McClintock, op. cit., p. 52; Lebow, op. cit.

⁹ Quoted in S. K. Sharma and Usha Sharma (eds), *Encyclopaedia of Tibet* (New Delhi: Anmol Publications, 1996), p. 191, emphases added.

¹⁰ Alexandra David-Neel, *With Mystics and Magicians in Tibet* (London: Penguin, 1936/1931), p. 105.



就是被看作“高贵和富有魅力的”¹

人们无数次贬低原住民并将他们跟污秽和肮脏联系起来。玷污和病态的话语被用于实施殖民压迫以及在被殖民人民中灌输劣等意识。这在针对西藏和拉萨的表征中尤其如此，在那里，身体上的肮脏被象征性地看作是代表了藏人性格中的内在缺点。Thomas Manning，是在1811年第一个访问拉萨的英国人，写道：

拉萨的市容一点都不引人注目，也不令人愉快。居民们满身污秽。满大街都是狗，一些在狂吠，一些在咬兽皮，这些兽皮堆得到处都是，散发着停尸房的恶臭；有些人蹒跚着并且看起来有些乌青；有些人得了溃疡；有些人饿得快死了，还在被乌鸦啄食；有些人已经死了，正在被吃掉。总之，所有事情看起来都令人失望，激起了不真实的想法。甚至居民们的笑声在我看来都听不大清楚，好似鬼叫。²

英国外交部1920年报告中的“地理”一章被迫提及了简陋的卫生条件和处理尸体的“可怕习俗”，人们把尸体切成小块让秃鹫、狗和猪来吃掉。³ George Knight，1922-1923年英国远征西藏的指挥官，“证实”了贴在西藏上面的各种标签的真实性：“西藏是高山、寺院、僧侣的国度，也是女人、狗、污秽的国度，更是众多不洁之物的国度。”⁴ 然而，明确指责藏人肮脏的观点随着一些来访者重新评价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立场而开始改变。Chapman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造访了拉萨，修正了他事先形成的对拉萨的结论：“确实，那里的老百姓不洗澡，按照我们的标准，他们的房子是污秽的，而且他们生活在农奴的状态——但是他们是一群讨人喜欢的人。”⁵

对原住民的矮化往往伴随着否定的策略，通过这一策略，西方的作品把他者构想成无意义且无关紧要的，其结果是经常否定了他者的代理人（agency）、历史和语言。否定抹去了一个人能见到的一切，从而“为殖民想象的扩张以及欲望的追求腾出了一片空间。”⁶ 在殖民时期，这导致了在某些地方包括美洲、大洋洲和部分非洲为殖民统治的扩张进行了大扫除。用“处女”来隐喻大多数领地方便了殖民者的占有，尽管事实上它们在许多文化和人民的家园。在这些“空白的地方，西方可以书写文明、进步、现代化和民主这样的事情。帝国相遇成为了救赎的任务而不是征服和剥削。”⁷

理想化和自我肯定常常跟否定和矮化并存，在目前西方公众想象中正面的西藏异域化就是明证。矛盾的是，尽管有不同，西藏往往被看成是欧洲人认同的非西方文化。Hugues Didier，在讨论出现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西藏热时，指出它有两个极端：“一方面，西藏遥不可及，极其神秘，是亚洲最特异的国家；另一方面，矛盾的是西藏是唯一一个欧洲人能够认同的亚洲文化，他们看起来出乎人意的密切和相关——确实是一种对立的一致！”⁸ 当早期的基督徒在这里寻找失落的基督徒王国的遗迹时，神智学家在寻找这个智慧隐士迷失的兄弟。在19世纪中期，Joseph Wolff传播这样一个观点，即一群犹太人长期迷失在喜马拉雅山脉。⁹ 另一方面，纳粹党卫军在1938-1939

¹ Thierry Dodin and Heinz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2001), p. 397.

² Quoted in Frederick Spencer Chapman, *Lhasa: the Holy City* (Delhi: Bodhi Leaves Corporation, 1992/1940), pp. 146-47.

³ Foreign Office, *Tibet* (Number 70)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1920), p. 22.

⁴ George Knight, *Intimate Glimpses of Mysterious Tibet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 (London: Golden Vista Press, 1930), p.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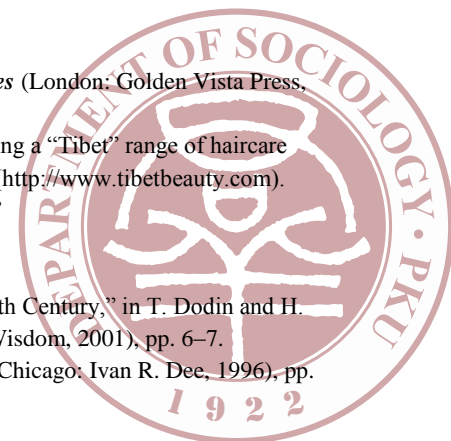
⁵ Chapman, op. cit., p. 146. Interestingly, British supermarkets since 2002 started selling a “Tibet” range of haircare (with names such as “rebirth” and “balance”), promising “beauty through balance” (<http://www.tibetbeauty.com>). Indeed, “Tibet” has come a long way from being a “country of the great unwashed.”

⁶ Spurr, op. cit., pp. 92-93.

⁷ Doty, op. cit., p. 11.

⁸ Quoted in Rudolf Kaschewsky, “The Image of Tibet in the West befor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 Dodin and H. Rather (eds),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and Fantasies* (Boston: Wisdom, 2001), pp. 6-7.

⁹ Lee Feigon, *Demystifying Tibet: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the Land of the Snows*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pp.



年派出一支探险队去查清是否西藏是纯种雅利安人的住所。¹ 于是，我们能看到有各种方式，其中常常是西方相互矛盾的愿望，在西藏进行试验。其中一组冲突的愿望通过色情化/道德化的策略实现了表达。

色情化—道德化

色情化和道德化对于西方对他者的表征来说很重要。涉及到阿拉伯人/非洲人放荡和贪婪的性欲、亚洲男子的女性化、驯服但难以捉摸的东方女人的可得性——这些主题在很多西方小说和非小说类作品都很明显。东方成为西方“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并不是排他性的）将性幻想进行到底的“沃”土。性无罪和性体验以及性支配和性驯服的思想在“西方和他者”²的话语中演出了一幕复杂的舞曲。

探险式的语言被标上了强烈的性别特征并从性描写中提取出诸多潜意识力量。对美洲的发现往往被看成是对未知大陆的发现以及衣着考究、文明的欧洲男人对赤裸的、可取的和有吸引力的原始美洲女性躯体的发现（例如，Jan van der Straet在1575年《发现美洲》中的描写）。女性化的地形，挑逗探险家去控制她、占有她——这个普遍的观点从15世纪开始就表露在探险文学中。因此1825年Edward William Lane描述他第一次看见埃及时，写道：当我到达这片海滩时，仿佛像一个东方来的新郎，去揭开他新娘的面纱，第一次去看她的面容，这幅面容或将让他着迷，也有可能令他失望和恶心。”³

这些在呼唤女性化空间方面很明显的帝国征服的色情性与启蒙运动对真理的追求有关联。归根到底，“学习、理解、了解、评价是征服的工具。”⁴ 欧洲人的观念被编译成是男子气的，而了解的对象则被编译成是女子气的。

通常，启蒙运动形而上学认为知识是两性空间的力量关系，被转换的过程和手段清楚地表达出来：男性揭开女性的面纱，深入到女性的内部；把它的“秘密”强行转化为可见、男性的面上科学。⁵

当Charles Bell谈到拉萨简直“未被白人碰触”的时候，他强有力地声明了知识和色情化的结合——“靠着崇山峻岭隔绝于外部世界，西藏一直以处女地的面目现身”⁶。Fernand Grenard对西藏的封闭以及欧洲人为了撬开她所进行尝试的挫折表示了遗憾：“事实上，藏人是几世纪以来改变最少的民族之一，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极难接近，并且顽固地反抗他人的探询。”⁷ 这与萨义德对在西方人想象中的中东的分析产生了共鸣：中东像一个处女一样具有抵抗性，但通过炸开、穿透这个僵局，男性学者赢得了这件奖品，尽管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⁸

毫不奇怪，在1903-1904英国入侵西藏之后，Curzon勋爵在一封给Sven Hedin（一位著名的瑞典探险家）的信中写道：“我为毁掉了你所钦慕的新娘的童贞而感到羞愧，这个新娘即是拉萨。”后者把这次远征形容成“对拉萨的强奸”⁹。在Hedin的信中，他表示失去了“使他为之着魔的去进入圣城的渴望”¹⁰。这些作家和评论员利用一个悠久的传统，即McClintock所说的“欧洲色情

14-15.

¹ Christopher Hale, *Himmler's Crusade* (London: Bantam Books, 2004).

² Stuart Hall,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in S. Hall and B.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302.

³ Quoted in Kabbani, op. cit., p. 67.

⁴ Said, op. cit., p. 309.

⁵ McClintock, op. cit.,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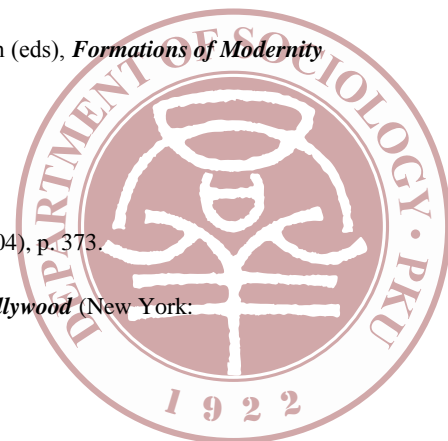
⁶ Charles Bell, *The People of Tibet* (Oxford: Clarendon, 1928), p. viii.

⁷ Fernand Grenard, *Tibet: The Country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Hutchinson, 1904), p. 373.

⁸ Said, op. cit., p. 309.

⁹ Orville Schell, *Virtual Tibet: Searching for Shangri-La from the Himalayas to Hollywoo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2000), p. 201.

¹⁰ Quoted in Bishop, op. cit., p. 176.



回归线”把“男性的旅行当作是一种强奸的色情”，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的地方就被“好色的色情化。”¹对英国入侵西藏最流行的隐喻就是“揭开面纱”。Edmund Candler就把他的纪实冠以“揭开拉萨的面纱”的题目。²

当把东方加以性别化的时候，色情化并非是西方所采用的唯一表征手段。道德化也是一种有效的工具。道德被看成是一种进步的信号。欧洲资产阶级道德代表了文明的顶端。这跟原住民、“东方人”和本国工人阶级中道德感的缺乏形成了鲜明对比。道德监督主要涉及监督妇女的身体。因此，监管不力的文化（像西藏文化）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在旅行家和评论家中的共识是，从道德方面来说，藏人排名较低，而授予妇女“自由”是这一低道德标准的原因和结果。污秽的话语被加诸于妇女的道德观以及妇女的地位上。一位英国赴拉萨远征队的成员作了这样的评论：

藏人的道德并不高，看起来俗人间有大量的男女乱交。我两次碰到了在布达拉后一条小河里男女共浴的聚会，这使我异常震惊，正如大多数藏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污秽和肮脏的。³

时间政治学

在西方对非西方他者的表征中，时间的政治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者已经被想象成在社会和文化上落后的（以时间的方式）——中世纪的（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前的封建社会）、古老的（例如古埃及人或美索不达米亚人）、史前的（原始的）或仅仅越过了时间的矩阵（无日期的）。提到当代西方评论家的殖民地旅行，往往被当作在地理空间上是前进了，但在历史时间上是回溯了。这种手段把现存的非统治集团加以剔除，并以现代性的名义使对其控制得以合法化。为了进入现代社会，落后的原住民要求更先进的外国人来统治/控制/指导/援助自己，这被认为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他者既是一个时间囚徒（冰冻在特定的历史舞台），也是一个逃脱者（远离时间之格和历史）。西方就是现在，它有义务/权利把进步带给**他者**。在时间政治学下都适用的整个时间表，通过欧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对西藏和西藏人的表征可以被阐明。世界被分割成按时间排列的不同年代的保留地，当我们进入西藏时，我们到达了一个不同的年代，仿佛“往昔的时光在这里持续并且那里还能被参观。”⁴

对西藏最流行的表征是，西藏是**中世纪的**。Candler沉思道：“藏人并非是所描绘的野蛮人。如果在中世纪，他们就是文明的”。他的感受得以被“证明”，那是1904年在拉萨一个西藏僧人攻击了英印占领军士兵这一唯一小插曲的结果。他描绘了一身穿甲冑、披风下藏着骑士之剑的僧侣如何疯狂地在营地外奔跑，这个中世纪的人用他类似嗜血的连枷烙印鞭打着空气。“第二天他被以中世纪的方式绞死在拉萨。”⁵公开绞死这个僧侣，意在对其他打算抵抗的藏人起到震慑作用。讽刺的是英国人却为他们自己的野蛮行为进行辩护，并把责任归咎到刑场的中世纪特征和受害者身上。

随着20世纪的到来，我们也看到了模棱两可和某种怀旧：“西藏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要比现在的英格兰的秩序晚上几百年。藏人对秩序井然有一种本能，这帮助了他们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立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又反过来帮助了秩序的持续。”⁶在Chapman的纪实中，模棱两可也跟怀旧混在一起：“西藏处在中世纪欧洲国家的位置上——在很多方面是我们现在反过来加以羡慕的位置”⁷

除了中世纪论外，西藏还被想象成与古老的世界平行。对于Perceval Landon来说，布达拉

¹ McClintock, op. cit., p. 22.

² Candler, op. cit.

³ Iggulden, op. cit., p. 8.

⁴ Francis Spufford, *I May be Some Time: Ice and the English Imaginatio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6), p. 212.

⁵ Candler, op. cit., pp. 246, 265, emphases added.

⁶ Bell, op. cit., p. 141.

⁷ Chapman, op. cit., p. 193.



宫是“古代神秘信仰的图像，这一信仰在拉萨金色宝盖之下找到了最后和最全面的表达。”¹ 正如在神智学家、新时代运动的先驱们的作品里，藏传佛教开始被想象成与古埃及宗教之间具有某种直接的联系。西方对于对西藏的想象中，也对原始人加以评点。在这一时期，原始人意味着不文明的人类生命形式，处于社会进化较低一等。Hensoldt 写道：

对藏人在人类发展程度中占较低位置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是愚蠢的……他们的文化是低于大多数半野蛮种族的文化，甚至比某些美洲大陆的印第安部落，诸如布埃罗人（Pueblos），祖尼人（Zunis）等，还要低等。²

Grenard 提到了“美洲红毛人”³，Chapman 写道，“我唱了一首爱斯基摩民谣，诺布（一个藏族伙伴）说它非常像西藏音乐——令人怀疑的恭维话，但有意思的是，从人种学上来看，我发现爱斯基摩人和藏人有非常近的关系。”⁴ 在西方想象中，一个西藏跟原始人有联系的重要象征，是通过诸如《丁丁在西藏》这一类著作而流行开来的“雪人”。

时间政治学不仅使把文化和人群固化在特定的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保留地成为必要，还使想象脱离了时间和历史的局限。在西方的表征中，诸如拉萨布达拉宫这样的地方象征了藏人生活的无时间性：“对我来说，布达拉象征着西藏人民的本质。在与周围崎岖不平的郊区的完美和谐中，布达拉具有一种特有的桀骜不驯的高贵；一种冷漠不变的特质——它仿佛是说：‘我在此地已有数百年了，而且我打算永远待在此地’”⁵。因为西藏落后于时代，所以导致进化程度较低和无时间性的观点，为两个相互矛盾的表征提供了立足之地——作为智慧宝库的西藏和作为非理性和孩子般的西藏。

婴孩化——老年化

东方在一些表征中是包含“东方智慧”的地方，而在其他表征中则是实质上非理性的、情绪化的、不文明的、孩子气的。Ella Shohat 和 Robert Stam 写道：“非洲能成为一个小孩而亚洲能成为一个衰老的老人，但欧洲总能保持住相关的优势。亚洲和非洲都被看作是组成性有缺陷的，同时欧洲则总是保持在价值负载等级制的顶端位置。”⁶ 婴孩化是一个重要的表征策略，通过这一策略，使得他者不具备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一点不奇怪的是，Rudyard Kipling 在《白人的负担》（1899）中劝告美国人要担负起教化菲律宾人的“责任”，他写道：“你们新捕获的闷闷不乐的人民，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⁷ 正如 Doty 指出的，在美国式镇压叛乱话语中把孩子般的特征添加到菲律宾人身上形成补充的是愚昧和无能。⁸ 婴孩化证明了由成年的、更开明的、理性的西方进行的监护和支持是合理的。正如在文中之前所指出的，“在英国人的支持和援助下”⁹，西藏人将获得兴旺——这一观点在英国侵略期间是很流行的。把世界调整为各种各样的诸如开化/不开化、现代/落后、发达/不发达等等的双重对立“被很好的构筑成成人和孩子的关系以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流程，在这些涉及到巧妙和笨拙的婴孩化手段的关系与流程中，二重分类

¹ Perceval Landon, *Lhasa: An Account of the Country and People of Central Tibet and of the Progress of the Mission Sent There by the English Government in the Year 1903-04*, Vol. II (London: Hurst and Blackett, 1905), p. 262.

² Quoted in Bishop, op. cit., p. 156.

³ Grenard, op. cit., p. 72.

⁴ Chapman, op. cit., p. 52.

⁵ Ibid., p. 7.

⁶ Ella Shohat, E. and Robert Stam,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39.

⁷ Quoted in Epifanio, San Juan, *After Postcolonialism: Remapping Philippines—United States Confrontations* (Oxfor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0), p. 99.

⁸ Roxanne L. Doty, “Foreign Policy as Social Construction: A Post-Positivist Analysis of U.S. Counterinsurgency Policy in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3 (1993), p. 313.

⁹ Graham Sandberg, *The Exploration of Tibet: Its History and Particulars from 1623 to 1904* (Calcutta: Thacker, Spink, 1904), p. 14.



法已经被实例化。”¹

在先前漫长的谈判期间以及随之而来的1903-1904年英国对西藏的入侵，把藏人比作顽固、没有逻辑的小孩是很普遍的。荣赫鹏（Younghusband）发现他们“非常像大小孩”。² 当谈到在之前的拉萨谈判期间藏人的态度时，Peter Fleming评论到：“逻辑这个概念对藏人的头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推理的能力甚至还没超出小孩子的水平”；他们并不回避问题，他们只是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³ Landon把这个说成是藏人有自己的道德观，在这一道德观里，他们是勤劳并具备“强大的肉体活力，虽然确实这种活力不过是在腿部肌肉而非手指的肌肉里找到出口，但这将是可以被预期的到。”⁴

在Guru对藏人的大屠杀，很好地说明了把藏人**婴孩化**在泯灭了作为侵略者、暴力犯罪者的欧洲帝国主义分子的良知的效果。据荣赫鹏（Younghusband）说，他发现“藏人挤在一起像一群绵羊”⁵，后来又把责任推给“完全丧失了理智的藏人将军的极端愚蠢和幼稚”⁶以及拉萨的神职人员：“无知傲慢的神职人员聚集迷信的农民去搞破坏。”⁷ 把藏人想象成孩子或者是愚笨的动物（绵羊），允许英国人去这样设想，如果没有那些“自私”的精英（即藏人的案例中的神职人员），普通人将欢迎欧洲人的统治。

把孩子的特征添加到菲律宾人身上，补充了他们的特征并使他们显得愚昧和无能；它也是一个智者之地，一个古老之地。正如Slavoj Zizek写道的：

赋予欧洲文明典型特征的是……其中心以外的特征——智慧的根本支柱、秘密雕塑、精神财富、已丢失的欲望的客体原因，这些在西方我们早已背叛的概念，在禁入的异域之地能被恢复。⁸

西藏的案例是把东方跟智慧和精神性联系起来的典型案例，这一手段也可以被称作老年化。根据它的年龄，把智慧加诸在地方身上，而不是在人民身上。虽然在Blavatsky夫人和Rudyard Kipling（通过他在基姆（Kim）的喇嘛角色）帮助下，把西藏跟寻找智慧与精神性联系在一起，但直到20世纪，这一结合才迎来了自己的势头。在以西藏神秘主义者的方式生活了多年后，David-Neel感到在喜马拉雅地区的高山和山谷给她传递了一条神秘的信息：“我所听到的是思想的千年回声，这一思想在东方被一遍一遍地重复思考，现在它似乎把它的堡垒安在了西藏雄伟的顶端。”⁹ Riencourt在描写他从西班牙的监狱逃到西藏时把它等同于“从战争和集中营的地狱中逃出，寻找神秘的禁地，地球上唯一一个智慧和幸福仿佛真实存在的地方。”¹⁰ 今天西方许多好心的自由主义者很可能都同意Robert Thurman把西藏的优点说成是独一无二的精神文明的赞美：

虽然西方和西藏的个性都享有意识现代性的集合体，但是他们在观念上却截然相反，一个注重物质，而另一个注重精神……当美利坚民族致力于更多的物质生产的同时，西藏民族则致力于更多的精神创造。¹¹

自我肯定——自我批评

¹ Randolph Persaud and Rob B. J. Walker (eds), “Apertura: Ra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ernatives* 26 (2001), pp. 374–375.

² Uncovered Editions,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Colonel Younghusband*, 1904 (London: The Stationary Office, 1999), pp. 105, 148.

³ Peter Fleming, *Bayonets to Lhasa: 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61), p. 221.

⁴ Landon, op. cit., p. 45.

⁵ Younghusband, op. cit., p. 177.

⁶ Quoted in Mehra, op. cit., p.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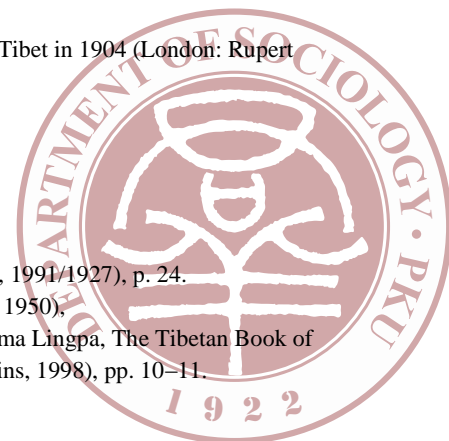
⁷ Younghusband, op. cit., pp. 178–179.

⁸ Zizek, op. cit., pp. 67–68, emphases in original.

⁹ Alexandra David-Neel, *My Journey to Lhasa* (New Delhi: Time Books International, 1991/1927), p. 24.

¹⁰ Amaury de Riencourt, *Roof of the World: Tibet, Key to Asia* (New York: Rinehart, 1950).

¹¹ Robert A. F. Thurman (Trans.), composed by Padma Sambhava, discovered by Karma Lingpa,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Libera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in the Between*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1998), pp. 10–11.



到目前为止,已识别的各种策略都被一种肯定意识所特征化;以一种道德优越性为名的自恋式的肯定。欧洲人把东方看作“一个用于自我戏剧化和差别化的借口,”一个“表演自我中心幻想的可伸缩的舞台,”接着“为想象和西方自己提供无穷无尽的素材和可能性。”¹在殖民时期,通过本质上肯定种族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想法,诸如“白人的负担”和“昭昭天命”来为当局和控制作辩护。把他者表征为非理性的、不道德的、无能的和欺诈性的肯定了把自我表征为理性的、道德的、有能力的和诚实的。肯定意识不仅能在公然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的作品中看到,而且还更多的在那些人道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作品中被找到。对他者精炼化和成见化表征的意义不是表征者的目的却是对被表征者的结果。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分子和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分子通过相似但也相互矛盾的表征动员、知识生产、管理的官僚化和强制力量的使用来建立控制,并使其制度化。

虽然西方的自我肯定是大多数表征背后的根本动力,但是有些人也采用特定的表征来质疑自我。即,对非西方他者的表征有时候也用于为自我批评提供服务。例如,这在西方对西藏表征的案例能被看得到,尤其是在20世纪以来。“我很高兴忘记我所属的西方国家,他们很可能将我再一次攥在他们可悲文明的手心里,”Alexandra David-Neel说。²然而,用他者来提供自我批评并不一定为被表征的他者带来解放。一些人对他者的正面成见化的与众不同甚至带有高贵色彩的意图并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可以预见他们对异域化的被表征者的影响往往是一致的——一幕支配、统治和利用的序曲。他们用一种优雅的替换机制在一系列帝国语境中发挥着作用,这一机制“用带有好奇心的甜言蜜语取代了权力的印记。”³于是,西藏继续为西方服务,为西方批评它自己、质疑它自己的价值观提供资源。正如Heinrich Harrer提到的,“相对我们自己而言”,藏人有“一种继承而来的优势……他们也许能给西方的悲观主义带来帮助。”⁴最近,由于对藏人事业的支持而闻名的好莱坞演员Richard Gere,哀叹道:“我想说,西方太年轻、太腐败。我们一点也不聪明。同时我认为我们希望有一个地方,那里很古老、智慧和开放,并且充满光明。”⁵

结论

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表征西方的他者的几个策略甚至在这个后殖民世界继续成为西方对他者表征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时以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公然的种族主义以一种更可接受的自由主义的销路更好的术语来表达。⁶把表征看成是一种加工流程和真实的方法,被更好的用于检验一些方式,在这些方式里,西方人对东方的发现和感知与西方人对东方的帝国统治紧密结合。今天,知识生产和“国家利益”之间、知识和权力之间依旧保持着紧密联系,这要求来自进步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更多的研究和分析。西方如何表征他者继续跟它所谓的利益和认同感交织在一起,并且对被表征者有实质性影响。

在藏人的案例中,西方的表征在塑造作为地缘政治实体的西藏的认同以及藏人的认同方面,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涉及中国主权和西藏自治的西藏问题的框架系统一直是通过英国帝国主义代理人把汉藏关系欧洲化的结果。⁷在承认中国政治上统治的同时,把藏人表征为过度的宗教性

¹ Robert A. F. Thurman (Trans.), composed by Padma Sambhava, discovered by Karma Lingpa,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Liberation through Understanding in the Between* (New Delhi: HarperCollins, 1998), pp. 10–11.

² David-Neel, *My Journey to Lhasa*, op. cit., p.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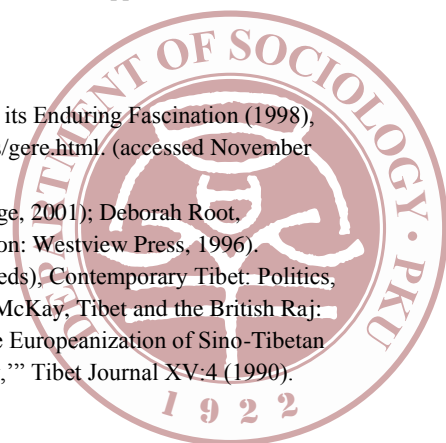
³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3), p. 159.

⁴ Heinrich Harrer, *Return to Tibet*, Trans. E. Osers (London: Penguin, 1985), p. 52.

⁵ Frontline, “Interview with Richard Gere,” *Dreams of Tibet: A Troubled Country and its Enduring Fascination* (1998),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tibet/interviews/gere.html>. (accessed November 26, 2005).

⁶ Graham Huggan, *The Postcolonial Exotic: Marketing the Marg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Deborah Root, *Cannibal Culture: Art, Appropri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ifference*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96).

⁷ Dibyesh Anand, “The West and the Tibetan Issue,” in B. Sautman and J. T. Dreyer (eds), *Contemporary Tibet: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Society in a Disputed Region* (Armonk: ME Sharpe, 2005); Alex McKay, *Tibet and the British Raj: The Frontier Cadre 1907–1947* (Richmond: Curzon Press, 1997); Dawa Norbu, “The Europeanization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1775–1907: The Genesis of Chinese ‘Suzerainty’ and Tibetan ‘Autonomy,’” *Tibet Journal* XV:4 (1990).



便利了西方国家要求对藏人“宗教和文化权利”进行保护。最近几年，一些作者已经强调了西方的表征对在西藏以及处于流亡中的藏人的生活不同方面的影响。¹ 藏人，尤其是流亡中的藏人，已经运用某些表征把它们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存续的手段。²

虽然这篇论文的重点是关于存在于世界部分地区的西方殖民话语，这些地区尚未纳入直接的西方殖民主义，但类似的表征方法对当代新殖民国际关系学的生产和再生产也是非常重要的。³ 例如，人们可以把美国的“反恐战争”作为一种表征的战争来研究，在这里，狂热、野蛮、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他者跟民主、开放、热爱和平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最近英美对伊拉克的战争期间，我们能识别出集结起来的精炼主义和成见化表征。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以解放为名对暴力的合法化——许多自由主义者跟政府串通一气，以双重术语刻画对伊拉克的占领——保护普通的伊拉克人，这些伊拉克人对对英、美人把他们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同时消灭狂热的恐怖分子感激不尽。

因此，理解非西方人民在殖民话语中被表征的方法能帮助识别类似的，在当代世界还在继续的过程。它将在政治层面突出对他者表征和表征方法政治化的本质。对非西方在西方话语的表征——包括学术的和大众的——仍然陷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进步的学术界需要对此进行挑战。

(感谢中央党校赵绪生教授的帮助：“Archival function 起档案的功能、European porno - tropics 欧洲色情回归线、Imperial encounters 帝国相遇”，以上几处均采用赵教授的建议。感谢林俊聪，周琰两位的校对。)

¹ Various studies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evival,” Lhasa protest movements, and identity articulations by Lhasa-Tibetans have revealed that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 by Tibetans is a result of negotiations with the dominant vocabulary offered by Western as well as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See Vincanne Adams, “Karaoke as Modern Lhasa, Tibet: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ultural Politic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1:4 (1996), pp. 510–546; Vincanne Adams, “Suffering the Winds of Lhasa: Politicized Bodies, Human Rights,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Humanism in Tibet,” *Medical Anthropology* 12:1 (1998), pp. 74–102; Robert Barnett and Shirin Akiner (eds), *Resistance and Reform in Tibet* (Delhi: Motilalbanarsidass, 1996); Melvyn C. Goldstein and Matthew T. Kapstein (eds),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Tib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Martin A. Mills, *Identity, Ritual and State in Tibetan Buddhism* (London: Curzon Press, 2002); Ronald D. Schwartz, *Circle of Protest: Political Ritual in the Tibetan Uprising* (Delhi: Motilalbanarsidass, 1996). Interaction with Western audience is also a very important dynamic shaping Tibetan identity/Tibetanness in the diaspora. This is an area that has received substantial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only since the la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See Dibyesh Anand, “A Guide to Little Lhasa in India: The Role of Symbolic Geography of Dharamsala in Constituting Tibetan Diasporic Identity,” in P. C. Klieger (ed.), *Tibet, Self, and the Tibetan Diaspora: Voices of Difference* (Leiden: Brill Academic, 2002); Dibyesh Anand, “(Re)Imagining Nationalism: Ident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ibetan Diaspora in South Asia,”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9:3 (2000), pp. 271–287. Also see footnote 11.

² Peter Bishop, *Dreams of Power: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London: Athlone, 1993); Peter Bishop,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Tibet, Media and Promotional Cultu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2 (2000), pp. 645–664; Lopez, op. cit.

³ Doty, *Imperial Encounters*, op. cit.; Hunt, op. cit.; Albert Paolini, *Navigating Modernity: Postcolonialism,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Lynne Rienner, 1999); Michael J. Shapiro,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Writing Practices in Biography, Photography, and Policy Analysi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